



海
国
图
志

柏拉图的“克里特远征”

《法篇》与希腊帝国问题

● 王 恒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柏拉图的“克里特远征”

《法篇》与希腊帝国问题

● 王 恒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拉图的“克里特远征”:《法篇》与希腊帝国问题/
王恒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海国图志)
ISBN 978-7-208-07759-1

I. 柏… II. 王… III. ①柏拉图(前427~前347)—
哲学思想—研究②法篇—研究 IV.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7953 号

责任编辑 毛晓秋
装帧设计 王小阳



柏拉图的“克里特远征”
——《法篇》与希腊帝国问题
王 恒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5
插页 5
字数 210,000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759-1/D·1362
定价 30.00 元

总序

“海国图志”丛书属于生者，为生命及其动力服务。它既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也属于受难的人和需要解放的人。不过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它严格地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正是这些人在进行一些大的事业和斗争，他们尤其需要模范、指导以及至关重要的安慰。

“海国图志”丛书的根本信念乃是对波利比乌斯的追随，正是波利比乌斯把政治历史恰如其分地称为统治一个国家的正当准备，称为最优秀的教师，这教师通过唤醒人类沉重的记忆来警戒当代，让当代学会承受福祸的交替。因此，“幸福”将遭到本丛书的抛弃，“荣誉”将重新夺回历史庙堂中无尚尊荣的惟一继承权。在本丛书中，“荣誉”将不再是叔本华或者边沁眼中的“我们自私自利的最美味的食物”，而将成为对所有时代中伟大事物的共同和恒久的信仰。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真正构成了对于无常灾难和世事交替的抗议。

歌德曾经谈论说：“当时代处于衰亡期，一切倾向都是主观的；当事物正在成熟以等待新时代时，一切倾向都是客观的。”“海国图志”丛书认为，在一切生者的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歌德式的戈尔迪之结，挥刀之间即可斩断；因此，有关“人类事务中渗透着一条辉煌原则”的辉格党式的朦胧信念将被拒绝，无论是格雷欣法则、亚当·斯密的市场法则、伯克的商业法则，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拉萨尔的工资铁律，都概莫能外地被视为“虚伪的假说”。另一方面，“海国图志”丛书也拒不接受“克丽奥帕特拉的鼻子”理论；我们尊重“偶然性”的可怕权能，但不会将之奉为人类事务的至高主宰；正如吉本的评论：“希腊人，当他们的国家沦落为一个行省之后，不是把罗马

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共和国的德性，而是归结为共和国的好运。”——这是失败者历来的观点和态度，就如同“二战”之后那些仍然值得敬佩的德国人总是把过去四十年的民族灾难归因于皇帝的浮夸、高龄的兴登堡恰巧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以及希特勒的个人性格那样。

卡莱尔曾将路易十五称为“一个极端世界性的混乱化身”。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崭新、多么普遍、多么变化迅速的运动啊：制度、社会秩序、人心，难道这些曾经合作的事物，现在以令人心烦意乱的冲突形式在翻滚着、摩擦着吗？必定是这样。这是一个终于衰竭的世界性的混乱的毁灭。”“海国图志”丛书同样拒绝卡莱尔的上述观念；因为在政治历史中，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时代；道德从来都是一个无从决断和没有答案的难题，更确切地说，道德根本不是一个问題，否则，我们将无从解释雅典的衰落和马其顿的崛起，无从解释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和罗马君主制的崛起；同样，我们在赞叹吉本的才华之余，却不得不反对他就罗马帝国的衰亡所作的普遍道德论的文化史解释，因为这一解释并未起到教化后世大英帝国的实际作用。

“海国图志”丛书意在尊重人类事务的本质，而不是盲从于那些不能产生实际效用的抽象理论；失败往往源自对最能产生实际效用的措施、原则和思想的抵制，转而去赞同那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系统的方法或原则。思想家们都试图把一个国家之伟大的特征告诉读者，并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然而，他们忽视了不可能有人预知未来，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及时认识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复杂性；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为国家的富强或者衰败作出自己的贡献，但谁能宣称了解一个国家？

进一步来说，人类事务的客观性并不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变化的那种标准；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的反对。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歌比历史“更严肃”、“更富有哲理”之类的话，因为在亚里士多

德看来,诗歌关乎普遍真理,而历史则只关注特殊与个别的事物。我们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这是因为我们遵从霍布斯的更合情理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名字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普遍的,因为有名字的事物中的每个东西都是独特的、个别的。”这也正是“海国图志”丛书的根本信念所在。

必须强调的是,“海国图志”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其性格和目的而言,我们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皆以此自勉。是为序。

“海国图志”丛书编委会

公元二〇〇七年十月

序

王恒博士的书稿《柏拉图的“克里特远征”：〈法篇〉与希腊帝国问题》即将出版，十分令人欣慰。伴随着这项研究的问世，柏拉图对话再也不是“言词中的城邦”，更不是虚无缥缈的哲学思辨，它恢复了历史的肉身，并直抵人类最宏伟的造物——帝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柏拉图终于在汉语学界“复活”了。

这项研究以主题的庄严大气见长，立意至为深远，行文颇具法学巨擘孟德斯鸠的以法释史、以史释法的古典风范。然而这项研究最值得称道之处却是在于，它提出或暗示了许多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彼此交织成了一个令人目眩的迷宫，要想从中脱困，还真是不容易。其中一个比较切身的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在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多神教文明谱系中，虔敬与政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涉及多神教文明的帝国天命问题，在当今一神教文明和帝国一统天下的大背景下，思考这一问题也许还不多余。

是为序。

林国基

二〇〇八年初春于罗德岛

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凡例

一、本书关于柏拉图文本的使用情况。

1. 本书引证柏拉图时,一般不注作者名,概括性引用时在文内注明 Stephanus 标准码(如“《法篇》,698b”),直接引用时则采用脚注的形式,引文用仿宋体标出。

2. 《法篇》的引文由笔者根据 Pangle 英译本译出,《书信集》的引文由笔者根据 Hamilton 和 Cairns 编辑的英译本译出,其他柏拉图对话的引文则采用了中译本的译文。《理想国》采郭斌和、张竹明译本,《政治家》采洪涛译本,《普罗塔戈拉》采王晓朝译本,《蒂迈欧》采谢文郁译本,《美涅克塞努》采戴子钦译本。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还参阅了参考文献所列的其他译本,特此致谢。

二、本书关于其他作家的引用。

概括性引用以脚注方式注明版本,直接引用则采用脚注方式,引文用仿宋体标出。

三、关于附录。

1. 《美涅克塞努》是柏拉图对话中除了《法篇》之外可与修昔底德的希腊史考古相比较的对话。从表面看,这篇对话模仿了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但细致分析则发现这篇对话与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有关。在对话中,苏格拉底对从建城开始到科林斯战争期间的雅典政制和政治行动进行了赞美,隐微地批判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帝国和伊索克拉底的政治观点。《美涅克塞努》对我们分析柏拉图关于公元前四世纪初希腊政治形势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本书的研究主题有紧密的关联,因此笔者将解释这篇对话的论文作为附录一并刊出。

2.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柏拉图的生平和时代,笔者制作了与本书

有关的“希腊大事记”，并提供了一张公元前431年的希腊地图，供读者参考。该地图原载于徐松岩、黄贤全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特此致谢。

柏拉图解释了色拉绪马霍斯的方法,搞懂了色拉绪马霍斯在形成青年人的品质和教导大众方面,比苏格拉底更能干;苏格拉底只具有对正义和美德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以及一种爱的力量,却并不具有形成青年人和大众的品格的能力;而哲学家、君主和立法者应该有能力运用两种方法:对特权阶层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对青年人和大众用色拉绪马霍斯的方法。

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第三十六节

亚里士多德有时企图满足他对柏拉图的嫉妒,有时企图满足他对亚历山大的感情。柏拉图对雅典人民的暴虐感到愤慨。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六卷,第二十九章,第十九节

目录

凡例 3

导言 1

第一章 柏拉图与《法篇》 19

一、柏拉图与他的时代 19

二、柏拉图与他的对话 30

三、柏拉图与《法篇》 44

第二章 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反思 61

一、雅典帝国的兴起对雅典政体的影响 62

二、党争与雅典帝国的衰落 70

三、斯巴达政体与斯巴达帝国 87

四、柏拉图的“亲斯巴达”倾向？ 100

第三章 复古与革命：柏拉图的“马格尼西亚”与雅典
“先祖政制” 114

一、地理对于立法的限制 119

二、立法者与法律序言 129

三、公民与土地 139

四、政制 153

五、教育、公民宗教与城邦的守护者 167

结语 182

参考文献 192

附录一：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的希腊世界地图 203

附录二：希腊大事记 205

附录三：柏拉图《美涅克塞努》释义 207

导言

(一)

帝国问题是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史中的核心问题。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等等,几乎构成了西方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主线,成为任何一个研究西方历史和政治的人都无法忽视的事实。尤其是罗马帝国,更是使得帝国这一术语获得了永恒的荣耀和经久不息的追思。在西方思想史上,帝国兴衰的问题吸引着无数一流思想家的杰出头脑和持久兴趣,甚至成为他们思考和写作的动机所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自传中回忆道:

1764年10月15日,当我坐在卡皮托山岗废墟之中沉思冥想时,赤足的托钵僧人正在朱庇特神庙中歌唱晚祷词,撰写一部这个城市衰亡历史的念头第一次涌上我的心头。^[1]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的结尾,孟德斯鸠也伤感地哀悼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并促使他将目光转向海峡对岸正在冉冉升起的大英帝国,在

[1] [英]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中译本序言,第5页。

《论法的精神》这一不朽杰作中深入地探究了英格兰政制的秘密所在。

然而,自十九世纪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和扩张,帝国和帝国主义日益受到人们的指控和批判,成为邪恶和动乱的代名词以及其他民族不幸的根源所在。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列宁将帝国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以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更是紧密地纠缠在了一起。

但是,这样的批判并未勾销帝国问题,也不成其为我们忽视帝国问题的根本理由。尽管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民族主权国家在与帝国和城市的竞争中胜出,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样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权国家已经一劳永逸地成为了人类政治组织的最终模式,做出这样的论断现在显得为时过早。实际上,帝国的理念一直幽灵般地纠缠着西方人的心灵,贡斯当写于 1814 年的檄文——《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并未成功地将这一幽灵驱逐,只是改变了这一幽灵在现代社会中显现的方式。对此变形,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心知肚明,并在《论断与概念》和《陆地与海洋》等书中作出了深刻的研究。英国历史学家布赖斯在为神圣罗马帝国重写墓志铭时,也颇为深情地认为:

对于我们来说,帝国仍然是很多地浮现在过去的地平线上,对于他们,在他们走向未来的期间,帝国将会降落得愈来愈低。但它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永远不会丧失。因为古代世界的一切生活都汇集于其身,近代世界的一切生活从它这里产生。^[2]

[2] [英] 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380 页。

因此,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对帝国问题进行轻率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深入地探究西方古今帝国的差异,尤其是古今帝国兴衰的动力和模式的差异,从而得以更为深入和准确地理解我们的过去和现状。

与罗马帝国相比,谈论希腊帝国问题显得有些尴尬和清冷。首要的原因当然在于希腊并未能够像罗马那样成功地扩张,也没有能够像罗马那样获得一个帝国的普遍样式,更没有像罗马那样经受了时间的考验。^[3]以至于思考这一问题的学者不得不首先自问:我们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谈论希腊帝国?

如果我们将巴比伦和波斯这样的古代东方帝国,或者奥古斯都之后、尤其是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的罗马帝国,抑或中世纪但丁笔下的世界君主国视为帝国的标准样式的话,那么希腊帝国问题将无从谈起。然而,这样的理解无疑缩小了帝国的范围和意义。在此,笔者无意对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帝国样式进行分类和定义,而仅仅关注这样的事实和问题:一个国家或者城邦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崛起,对周围的国家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将这些国家和地区连成了一个整体,并且这种支配性的影响获得了世界历史意义,就可以将这样的国家或城邦视为一个帝国。由此,尽管斯巴达和雅典并未获得后世罗马那样的成功和样式,但我们仍可将其称之为斯巴达帝国和雅典帝国。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斯巴达就支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并在公元前五世纪初和五世纪末两次将影响扩大到了整个希腊世界。雅典亦是如此,从希波战争之后,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为止,他们控制了希腊周围的海洋。而当时的希腊世界,几乎就是整个西方已知的文明

[3] 布赖斯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像罗马一样,曾是建基于三个世纪的征服和四个世纪宁静统治时期所奠定的那样安稳而深厚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罗马帝国是一个世袭的或地域性的王国,那么它可能会随着它的王室的断绝,部族的被征服,与之相连的那个城市的毁灭而覆亡。但它没有这种局限。它是不可能覆亡的,因为它是世界性的。”[英]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第359页。

世界。

与帝国样式(eidos)的概念纠缠相比,帝国兴衰的经验和启示更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弗格森在研究希腊城邦的扩张时恰当地指出:

尽管罗马人的扩张成就非常突出,而且在巩固他们的权力、使帝国永久存续方面体现的政治智慧无与伦比,但我们仍必须承认,在战争、外交和统治艺术方面,他们是其先驱者——希腊人的继承者。他们是以比斯巴达人、雅典人更强大的实力、在更大的范围内从事工作的,他们还将从马其顿人光辉的成就以及沉痛的错误中得益,虽然他们消灭了后者建立的各个王国。他们的成功,不过是把斯巴达、雅典和马其顿作为同僚进行的帝国主义运动推到了顶峰。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系列论文中依次考察希腊人进行的帝国试验。通过这些试验,希腊人不仅赢得了展示他们天才的场所,也为古代世界统一于罗马帝国开辟了道路。^[4]

弗格森追溯了希腊国家形态的发展,并指出这些形态尽管笼罩和规避着帝国主义,但最终证明了帝国主义的正当性。然而,弗格森将主要的精力花费在了希腊城邦转向帝国历程的失败及其缘由上,并没有透彻地解释希腊城邦进行帝国扩张的根源所在,从而没有能够解释古代世界为什么最终必然会融汇到了罗马帝国中。对于这一重要的疑难问题,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则通过对古代城邦的经济基础的研究,深刻地指出了古代城邦帝国扩张的根源和特征

[4] [美] 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